

黄郛与
近代中国政治



Huang fu yu Jindai Zhongguo Zhengzhi

李凤琴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黄郛与近代中国政治

李凤琴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郛与近代中国政治 / 李凤琴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310-05309-4

I. ①黄… II. ①李… III. ①黄郛(1880—1936)—人物研究②政治—历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7=6②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120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立松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 插页 202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

黄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辛亥革命、北京民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坛上,都有十分值得关注的影响。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郛作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对当时国家政策的决策和时局的演变都有特殊的作用。

凤琴通过阅读大量的文史资料,细心分析求证,在书中对黄郛一生的政治活动与言论进行梳理,着重探索了他及他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作者的以下观点颇有新意:

第一,黄郛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代表。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实际上就是当前史学界通谓的那种“中间势力”或“第三种势力”,或西方所说的“自由派”及“民主个人主义者”流。但这些称谓均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确定性含义,就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也不足以贯穿始终或区分中外,故实又应有此一别称。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只追求为“帝王师”,而不追求“师帝王”;负天下任而不为天下先;结党而不纳士。

作者通过对黄郛一生的政治言行研究,认为其一生政治行为特点亦表现在:主要居于“王者师”的幕僚地位,以政策思维影响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当权派掌握的政府实体,谋求在交叉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但始终保持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并试图以之对当权派进行意

识形态的改造。怀澄清宇内之志，敢为天下先。军而不阉，不党自魁，招贤不结士。

第二，黄郛是政学系的政治灵魂与精神领袖。

政学系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就其性质言，则是国民党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学系在国民党体制内能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决定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本身的特点，也缘于黄郛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由于黄郛与蒋介石早年在辛亥革命中金兰结义，后遂成为蒋的入幕上宾，由此也直接间接使一批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集结在蒋介石的政权中，但这一政治派别从来没有过实际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纲领，维系他们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对黄郛的政治行为做出客观评价。

黄郛一生在政治前台活动的时间很少，但其出处大都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关头，特别是在中日关系紧张时期，他的活动尤为活跃，因此引来的争议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大。黄郛从其言论到行为，都始终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要把他的根本政治立场与具体政治策略分开，不可轻易冠以“亲日”之名。

这本著作是凤琴在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于材料的原因和作者的研究能力，有些方面的探讨还不尽如人意。如黄郛及政学系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这些都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和提高。

刘景泉

2014年12月16日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意义	1
二 学术史的回顾	3
三 写作的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	8
第一章 儒将崛起	13
一 投笔从戎	14
二 辛亥风云	20
三 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	37
第二章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浮沉	60
一 身居津门 心怀天下	60
二 再入仕途	81
三 “首都革命”	90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运筹	100
一 赞襄北伐	100
二 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	111
三 出长外交	123
第四章 退隐时期的政治思考与实践	136
一 对国事的关注与研究	137
二 新中国建设学会	145

三 改造农村社会的尝试·····	151
第五章 政整会时期的作为·····	155
一 《塘沽协定》·····	155
二 《塘沽协定》的善后交涉·····	177
三 政整会的政务整理·····	189
第六章 余论·····	198
一 “亲日”还是“睦邻”·····	198
二 为何不入国民党·····	209
三 “政学系”还是无派无系·····	211
四 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代表·····	215
结 语·····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37

绪 论

一 研究意义

说起黄郛,即使许多学历史专业的人,也感到十分陌生,有人甚至连黄郛的“郛”字也不会读,除少数研究者外,大多对其人其事语焉不详,或仅有一简单的“亲日派”“汉奸”之类的印象。笔者在选此题之前,也只是略知其人其事,对之没什么深入认识。后在导师的指导下翻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始知其人不仅为辛亥革命之风云人物,且在北京民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舞台上都极有影响。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在蒋介石幕中参与中枢,借箸代筹,凡军国大事,多有他的影响,被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喻为“当代严子陵”。为什么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竟如此薄弱,不禁激起我的探求兴趣。推究这一页历史久为尘封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黄郛生前虽多次出任政府要职,但在位时间均极短,且不以向政治讨生活为唯一途径,就算在其盟兄弟蒋介石执掌大权时,也宁愿居客卿身份,难进易退的风格使其在世既不张扬,身后更显寂寞。二是材料缺乏,难免使研究者望而却步。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出版了沈云龙先生撰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该书首次系统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遂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黄郛虽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公开活跃的时候少,但出处动关国家大局。从他 1905 年留学日本到 1936 年 12 月病逝,民国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他都亲历或间接参与。其任事多属艰巨,又往往处在国内外各种矛盾交错并行斗争激烈的关头,故当时与后世于其行为颇多争议,尤以办理对日外交最为突出,遂使之成为民国史上有重大争议的人物之一。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济南惨案”的交涉,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时关于《塘沽协定》的交涉,及以后参与的通车通邮谈判,都属争论的焦点。各方言论,有诋之为汉奸、卖国贼者,有誉之为有国土风度,能委曲求全,如救难之菩萨者。一生毁誉,多由此出,孰是孰非,无有定论。凡此种种,都有待于史学工作者详察细究以再现历史本来面貌,这也是对民国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要求。

黄郛一生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不能只看作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行为,其思想特点与行为方式既反映了他的个性,也折射出他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可称之为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性。这一政治派别,实际上就是当前史学界通谓的那种“中间势力”或“第三种势力”,或西方之所谓“自由派”及“民主个人主义者”流。但以上指称均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确定性含义,就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也不足以贯穿始终或区分中外,故实又应有此一别称。本书认为,黄郛其人在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的思想与行为表现,就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表现,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所谓新政学系(即通常所说的政学系)这一政治派系的出现,就是源自黄郛。政学系的政治思想与行为,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莫不若合符节,实际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体制内的代表,黄郛实是其开山鼻祖。尽管他竭力否认自己属于政学系,但时人与后人,都目其为政学系的实际首脑与政治灵魂,此一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此,对研究黄郛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廓清有关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个案解剖,进一步探讨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中华民国政治史上行为的演化以及对中国近代政治所发生的作用与影响。这应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也是民国史研究中容易被忽略而又应该必须被重视的部分。

二 学术史的回顾

有关黄郛的专门研究,就目前情况言,尚未见到国外史学界的专门论著。从国内来看,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都出自台湾学者,大陆方面较少。台湾方面,有沈云龙先生编撰的专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与《黄膺白先生年谱补编》,谢国兴先生的《黄郛与华北危局》。

沈著黄郛年谱编撰前后历时十数年,1976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此书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搜罗之富,为研究黄郛专著中首屈一指,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它不同于一般年谱的显著特点是:一般年谱除谱主生平外,只收录与谱主切近相关之事,其他一概从略。沈著年谱则不然。而是本援引务详、引申务广的原则,将同时代国内外大事,同时附于书中,把谱主的活动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微观的历史细节,又能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历史脉络。于学习与研究,都大有裨益。沈著黄郛年谱补编则是在长编基础之上,以黄郛日记为主作进一步的补充,叙事时间是从1929年1月至1930年4月。其中所披露的一些内容不为当世常见,是研究民国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谢国兴所著《黄郛与华北危局》,由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于1984年刊行。此书按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华北危局出现的根源及中国不抵抗政策的由来。认为华北危机出现的外因是

日本推行其一贯的大陆政策的结果,并详细分析了大陆政策的缘起、演变、发展及以邻为壑的侵略本质;内因是中国本身内忧重重,无力对外,以是招致外侮。这也是中国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关于不抵抗政策,他的界定是,“不抵抗”常被冠以“主义”或“政策”,多半是一种习惯用法,两者之间在语义上并无特别的区别。就“不抵抗主义”来讲,此一“主义”本身无多少学说或理论根据可言。就“不抵抗政策”来说,此“政策”也不是政府明示的方针。事实是,“不抵抗”只是一种概括性说法,专指以折冲妥协的方法因应日本挑衅的一种措施。而此书采“不抵抗政策”一词,主要原因是,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方既推行“大陆政策”,另一方以“不抵抗政策”为回应,盖取其名词之相呼应而已,并无与“不抵抗主义”示区别之意。书中对中华民国初年直至长城抗战时期历届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进行了回顾后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时,日本未出兵,中国已屈服于最后通牒,而后军阀割据,内政无轨。国民革命时期,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此时,日本还是消极制造冲突,政府仍是无力抵抗,遂采不抵抗政策使日本无由扩大事态,可谓是欲“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也达到了使之撤兵的目的。待到全国统一,国民政府高唱收回主权,外交当局气势颇壮,而成果有限。此后对日又蔽于所知,“九一八”事起,遂至仓促而手足无措。当时日本已采积极进攻手段,我方不明形势,仍以消极的不抵抗应付,导致东三省丧失。就以上民国以来几次不抵抗政策的实际演变讲,都仅具有消极退让,暂求苟免的效果,于积极性的生聚教训之意义,多未曾实现。“九一八”以后东北义勇军的斗争及“一·二八”与长城抗战的抵抗虽然一定程度上洗刷了不抵抗的耻辱,但并未获得抵抗的效果。由此,当1933年5月日军兵临平津城下时,政府也只能重拾旧策,仍以不抵抗为挡箭牌。第二部分简要叙述黄郛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政治的一般见解,并对黄作了性格方面

的分析。关于黄郛的性格,他举了三项特征:第一,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而知识分子的定义,他认为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二,有担负国家政治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该书认为,黄郛因出身军职和从政关系,于第一点是计虑难及,其他三点,则是当之无愧。而强烈的国家意识是其立身行事的总发源,具体表现为书生型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热心政治而不热衷权力,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故胸襟气度恢宏,不计个人牺牲。第二,理性的保守主义性格。这里所说的保守性,主要指黄郛政治行为的稳健与虑事之慎重。而指导其行为的,为理性的观念与态度。第三,反权威主义性格。作者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具“主从类型”(Superior-subordinate pattern)或谓“权威类型”(Authority-dependency pattern),一般人多注重权位追求而较忽略个人人格之发展,因之导致政治上的病态现象。服从权威,重人治胜于法治,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确实是权威主义盛行的可能结果。反权威主义者则具有特立独行之性格,自由主义之精神,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正是黄郛性格中所具有的一面。第三部分是全书的主体,详述华北危机的出现以及黄郛受命北上应付危局的全过程并得出结论。认为分离华北、分治中国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部分,《塘沽协定》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全平津,争取全面抗战时间的不得已的策略。就预期的功能看,起到了暂时维持和平,在夹缝中求生存,加紧经济建设,培植内力,准备与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效果。黄郛促成停战协定,表现了勇于负责的精神。而其后黄为延缓和解决危局推行的种种政策,虽因时代条件限制而成效不彰,黄本人实际也本着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的心态；唯其动念与心志之价值，则应予肯定。

就以上三部专著言，沈著年谱自然是以材料见长，一般不作专门议论，但寓观点与倾向于行文之中。谢著以研究黄郭 1933—1935 年的政治活动为重点，长于史实的叙述与考证。而且从黄郭的个性特点探求其政治行为的根源，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但总体来讲只是就其人其事本身而论，并未以阶级分析的观点从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深层挖掘其政治言行之所由。

另外，2005 年 1 月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学者张学继先生的《黄郭传》，此为目前关于黄郭的唯一传记，梳理了黄郭一生的重大史实，但作者对于传主许多重大政治行为与政策取向的认识与评价、对传主的历史定位与评判，则大多与本书观点相左。

除以上专著外，专门研究黄郭的论文，中国台湾方面主要有：

沈云龙：

《黄膺白之特立独行》，《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2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年。

《黄膺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传记文学》（台北）第 10 卷第 1 期。

《黄膺白先生百龄诞辰纪念》，《传记文学》（台北）第 36 卷第 3 期。

《黄膺白（郭）先生百龄诞辰特辑》，《传记文学》（台北）第 36 卷第 4 期。

《黄郭摄阁的前后》，《中国现代史丛刊》（台北）第 2 册，1960 年。

《〈塘沽协定〉后的所谓“北平会谈”》，《传记文学》（台北）第 11 卷第 1 期。

《从撤邮到通邮——〈塘沽协定〉后的中日交涉问题之一》，《传记文学》（台北）第 12 卷第 4、5、6 期。

黄膺白先生纪念专辑:《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黄膺白》,《传记文学》(台北)第11卷第1期。

谢国兴:

《〈塘沽协定〉的由来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3期,1984年,第197—237页。

《黄郛与济案交涉》,《史学集刊》(台北)第13期。

吴相湘:《最有担当的政治家黄郛》,《传记文学》(台北)第8卷第1期。

梁敬镛:《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初稿)》,《传记文学》(台北)第10卷第5、6期。

中国大陆方面主要有:

杨天石:

《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张学继:《陈其美与黄郛关系述论》,《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

祁冰:《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外交官黄郛》,《民国春秋》1999年第3期。

以上文章除记述黄郛生平事迹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1933年华北军事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的签订及《塘沽协定》善后谈判,以梁敬镛、沈云龙、谢国兴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大量的一手材料,对史实进行十分详尽的考证。尤其是已故旅美史学家梁敬镛,掌握了战后日本公开的非常丰富的侵华史料,其中有些原属其国家重要机密。在对这些史料进行缜密分析的基础上,他详细阐述了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客观再现了从山海关至卢沟桥事变日本的侵华历史。有关《塘沽协定》

的交涉与签订是其中一部分。第二,“济南惨案”。以谢国兴先生的研究较为突出。另外,杨天石先生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黄郛档案,在以上两方面也作了富有新意的探索。第三,“首都革命”即北京政变。主要以沈云龙先生《黄郛摄阁的前后》的阐释分析较为客观。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以上三方面的历史事实,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但存在的问题是,对黄郛在以上历史事件中活动的评价,台湾学者偏于溢美,大陆学者失于苛责,当以梁敬镛先生的观点较为公允。

三 写作的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

就目前史学界关于黄郛的研究状况看,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几个具体历史事件,时间上也主要局限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缺乏对这一历史人物较全面的了解。而事实上,黄郛在同盟会建立、辛亥革命及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政治活动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对黄郛参与的具体政治活动研究较多,而对其关于国家大政的战略策略思想研究薄弱,而这恰是他一生以“王者师”形象地位自居,用政策思维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第三,对黄郛政治行为的评价多归结为个人品行与修养,很少从他的阶级属性出发分析这些行为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并作意识形态层面的解读。所以,有关黄郛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挖掘。针对以上情况,本书的写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点有所突破:其一,对黄郛一生的政治活动作尽可能全面的描述与澄清,特别要使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者再现于世,被误认或曲解者得以纠正,不再以讹传讹。其二,注重对黄郛政策思维方面的言论和著述的研究,以求更深入地理

解解释其政治行为。其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其个人行为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探求其所代表的阶级得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内涵,分析这种意识形态在指导个人政治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从而观照其个人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命运。本书关于黄郛评价的归结点是:黄郛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代表,这种提法,就目前史学界公开的成果看,应该属于首创。管见所及,恰当与否,还有待于方家指教。以上三点,也即是本书的创新所在。

基于以上诸因素,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先廓清史实,在此基础上,再作综合的分析评价。因此,本书前五章以叙述与考证黄郛的政治实践与言论著述为主,间以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议论。第一章主要介绍黄郛的出身及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活动,包括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组建“丈夫团”,投身辛亥革命并在沪军都督府任参谋长,参加“二次革命”及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参加护国运动。黄郛从清末弃文习武入浙江武备学堂、东渡日本留学并参加同盟会,到回国在清政府军谘府内任职,是其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积极准备阶段。他选择的革命的具体方式既不同于孙中山,也有异于宋教仁,主张以清政府的统治中心为革命的突破口,收高屋建瓴、事半功倍之效,用最小的破坏代价,获取最大的成功,从而使国家建设事业迅速步入正轨。但辛亥革命甫一爆发,他便急速南下投入斗争,特别是在沪军都督府参谋长任内,协助陈其美运筹帷幄,肆应内外,发挥了重大作用。宋教仁案发生后,黄郛虽不赞成武力解决,但仍然服从党议追随陈其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自此,他因与孙中山、陈其美政治见解愈加分歧,虽自命为革命党,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却拒绝参加任何组织，走上了人称为“特立独行”的道路。^①第二章以其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重大活动为主要研究范围。此时黄郛居家天津或北京，初以治学读书为主，尤以研究一战及战后世界政治经济著称，目的在于使国人意识到中国存在的困难与面临的危机，认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指出救亡图存的途径。故其治学绝非象牙塔中为学问而学问者可比，而是以现实的政治生活为直接对象，提出自己的政策思维成果，希望见纳于当道。所以与其谓之为著书立说，倒不如说是居在野身份以“王者师”形象自处，而对“懵懵不醒”的当政者施加影响。后参加实际政治活动，不外对内推动和平，对外争取主权。为此，他积极组织促进南北统一的和平运动，并在华盛顿会议与关税特别会议期间，为废除“二十一条”及争取中国关税自主而折冲奔走。他还出任过北京民国政府一任外交总长与两任教育总长，虽都为时极短，但仍被社会评价为做事胜于做官。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因此一直心怀竟辛亥未竟之功之夙愿，其与冯玉祥策动的“首都革命”，就是把这一愿望付诸行动的具体体现。这也是黄郛政治上最得意的一次大手笔。第三章以黄郛1927年南下襄助蒋介石为始，至1928年受“济南事变”交涉刺激退出政坛止。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促成以中国银行为核心的江浙财团与蒋介石军事权力集团的联合。在黄郛的联络运作下，以江浙资产阶级为后盾的

^① 沈云龙《黄膺白之特立独行》一文开篇有如下一段文字：“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序：‘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故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之士，大抵非狂即狷，而历代衡量人才之标准，亦往往以狂狷与中庸并列焉！民国以来政坛显赫人物，或因缘时会，或依附权势，兴勃亡忽，比比皆是，其能合乎狂狷之义，进取而有所不为，志行高亢，独来独往，不诡随流俗，时时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无党人与官僚之陋习者，舍黄膺白先生外，尚不数数观也。”见沈云龙主编：《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